

菲律宾华人参政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许梅

(暨南大学 东南亚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华人参政; 历史演变

摘要: 本文论述了菲律宾华人参政的历史演变。认为该国华人参政现象日益增多, 参政意识不断增强, 但参政之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中图分类号: D73.341.6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3925(2001)04-0038-03

华人移居菲律宾的历史十分悠久,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菲律宾华人人数不多,与当地的同化程度仅次于泰国。据1993年的统计,在菲律宾约有1000多万人拥有华人血统,占总人口的10%以上,纯正华人血统的约有100多万人,占菲律宾总人口的1.5%左右。长期以来,随着华人与当地人通婚、同化,有一部分人已很难分清是土著还是华裔了。从血统的观点来看,菲律宾究竟有多少华人、华裔,的确难计其数,尤其是那些华菲混血儿及其后裔的民族身份更加不容易确认,他们很早就融入了当地的政治生活。前总统奥斯敏纳、马科斯、科拉松·阿基诺,以及许多政界人物和政府官员都具有华人血统。尽管如此,菲律宾华人的参政之路却是漫长而艰辛的。

一、二战前菲律宾华人积极参加当地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菲律宾的近现代史可以说是一部长期受西方殖民统治的历史。1571年至1898年,西班牙对菲律宾实行了长达300多年的殖民统治;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

后至1941年,菲律宾进入美国统治时期;1942年开始又被日本占领,直至二战结束。因此,在二战以前,菲律宾华人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为与菲律宾人民共同反对殖民统治者的斗争。此外,菲律宾华人针对殖民当局的歧华、排华政策所进行的多次政治抗争,也构成了该时期华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在西班牙300多年的统治中,掠夺的欲望以及对华人文化上的偏见和经济上的畏惧心理,导致殖民者对华人实行长期的歧视和排斥政策,华人常常成为殖民者勒索和施暴的对象。华人从一开始的畏缩、容忍到后来奋起抗争。1603年、1639年以及17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末,长期遭受虐待和迫害而忍无可忍的菲律宾华人,先后掀起了几次较大的起义和抗暴斗争。除此之外,华人还积极参加菲律宾人民的反西斗争。一位西班牙人曾记载道,在17世纪爆发的一系列反西起义中,“无论什么时候西班牙人同菲律宾人作战,在战场上都可以发现许多华人的尸体,因为在所有的场合中,华人都充当菲律宾起义者的辅助部队”^[1]。

1896年西班牙统治后期,菲律宾爆

发了大规模的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许多华人都积极参与,不少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菲律宾的独立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华侨将军刘亨贻。他不仅亲自带领菲律宾起义军同西班牙殖民军作战,建立了卓著战功,而且还四处奔走,动员华人为菲律宾革命捐赠财物,募集了大批资金,同时还鼓励华侨青年踊跃参加革命军,为菲律宾的独立和自由而战斗。对此,曾经领导了菲律宾独立战争,后又成为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的阿吉纳多作出了积极评价:“宝阿将军(即刘亨贻)的公正无私和英雄风度,已获得全体菲律宾人民的感佩——他正是为他们的自由和幸福而献身的。他既然热爱菲律宾一如其祖国,菲律宾自当视之为她的英勇之子孙了”^[2]。

在1898~1946年的美统时期,虽然美统当局对华人的政策较为宽松,但其中也不乏许多歧视性的法令。菲律宾华人为此掀起了几次大的抗议浪潮。第一次抗议浪潮发生在1905年,第二次则发生在1909年到1910年,主要都是针对1902年美统当局颁布的移民法案,此法案是参照美国的移民法制定的,是一部专门对华

人移民实行限制和排斥政策的法案。菲律宾华人遵循符合宪法的一切途径,由中华总商会出面交涉,最终使该项法案被迫延迟。此后,该法案虽一再被提出,但均未得以实施,直至1940年。菲律宾华人的第三次抗议浪潮发生在1921年,由于美统当局为了限制并消除华侨的商业势力,提出了专门针对华商的“簿记法”。“簿记法”禁止华人用中文记帐,规定“凡是从事商业的个人、公司和商行,如不以英文、西班牙文或任何本地语文记帐,将是非法的”^[3]。此举主要针对华人,因此引起了华商的强烈不满。中华总商会多次向有关当局提出抗议和交涉,并研究采用一切手段阻止“簿记法”的实施。后来还推举两位代表远赴美国,向联邦法院提出申诉。经过五年多时间的抗争,花费了16.7万多比索的费用,最后,“簿记法”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获得解决^[4]。

1942年,日本占领菲律宾后,菲律宾人民的抗日斗争同时展开,菲律宾华人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就是其中较为英勇的一支。他们与菲律宾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相互配合,并肩作战。在三年时间里,“华支”转战吕宋岛14个省和马尼拉市,经历了260多次大小战斗,歼敌20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战利品,77人牺牲,43人受伤^[5]。类似“华支”这样的由华人组成的抗日力量在菲律宾还有不少,他们为菲律宾的抗日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总的来说,二战以前菲律宾华人在政治上大都认同自己的祖国——中国,因而极少介入和参与菲律宾的政治活动,除非自身的生存与利益受到极大的危害,他们迫不得已才进行抗争,即便如此,他们对菲律宾政治的这种有限介入也是十分微弱的。一方面是由于殖民统治者对华人实行的歧华、排华的残酷政策的影响,华人很少会把菲律宾当作自己的久留之地,他们既不认同菲律宾,也不被菲律宾所认同;另一方面,华人的侨居身份和客居意识,加上华人所固有的政治文化心态也影响了他们的参政热情。他们原本无

意介入和参与居住国的政治和政治活动,后来之所以参与菲律宾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是由于在殖民统治(尤其是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他们与菲律宾人民同样受到殖民当局的欺压,甚至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和虐待以及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在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以及后来的抗日斗争中,他们与菲律宾人民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他们甚至比菲律宾人更加痛恨殖民者,因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华人积极参加菲律宾的抗日斗争,也有从自身的民族主义感情出发之因素,为了配合和响应祖国国内的抗日革命浪潮,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投身其中。这一时期,菲律宾华人的反殖斗争常常是同中国国内的爱国运动相互呼应、同步进行的。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菲律宾华人反对美统当局对中国移民的歧视性政策所进行的抗议活动,以及1942年开始的菲律宾华人的抗日斗争,都受到祖国爱国运动的深刻影响和推动。

二、菲律宾独立后华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进行的政治努力

1946年,菲律宾正式独立。由于受过去300多年来西班牙殖民者在种族与文化上对华人的歧视和偏见,以及独立后菲律宾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美国冷战思维的影响,助长了菲律宾人特别是菲律宾政客对华人的不满和怀疑态度,影响了华人与菲律宾社会的融合进程。加之长期以来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华人常常成为菲律宾政客攻击的政治目标,主要反映在经济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这一时期菲律宾不断推行的以限制、排斥华侨为目的的一系列菲化政策。几乎每次国会开会都要审议不下10件有关菲化的提案,这些提案范围极广,涉及到各行各业,其中经国会审议通过并最终实施的有公共市场菲化案(1946年)、银行菲化案(1948年)、进口商业菲化案(1950年)、零售业菲化案(1954年)和米黍业菲化案(1954年)。一向以经商为主业的菲

律宾华人,在战后菲律宾经济民族主义的浪潮中遭到巨大的冲击,因为菲化案几乎影响到华人经营的每一个行业。

华人曾试图通过加入菲律宾国籍来摆脱这一困境,因为国籍代表着经济权益,但菲律宾入籍法对华人入籍尤为苛刻,除了冗长的入籍程序外,还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因此,只有富有的华商才有能力达到条件。为了维护和保障自身的利益,华人一方面通过菲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出面,代表华人抗争菲化运动,同时加强与菲律宾政府的沟通协调工作,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另一方面根据菲律宾政治文化中重人情、重家族的特点,采用华人传统的“花钱消灾”的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层层疏通,以寻求政客的同情与支持。当时,不少华社领袖都认为金钱能够解决华人所面临的问题。在华人入籍无门的情势下,依靠直接介入菲律宾的政治活动来维护华人的经济权益的想法似乎难以实现,面对菲化运动,华人除了依时作出调整和改变外,唯有依赖手中仅存的经济能力施加政治影响,以避免不利于华人的提案通过。这种以金钱为手段,采取间接方式参与菲律宾政治活动的做法固然有着华人传统政治文化的因素所在,但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华人的迫不得已。此举虽然消极被动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是避免了诸如木业菲化案、面粉业菲化案、西药业菲化案等名目繁多的歧华提案的通过。当然,到后来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时期,华人对菲律宾政治的介入是一种为政治所迫的被动行为。尽管1975年之前也有一些华人、华裔直接参政的例子,但他们或是全然菲化成为地地道道的菲律宾人,或是为免遭歧视和排斥而不敢公开自己的华人血统和华人背景,他们完全以菲人的身份竞选参政。因此,对任何不利于华人的提案他们很难作出反应,更不用说维护和争取华人权益了。甚至菲律宾国会中有些完全菲化了的华人和华人混血儿或者他们的后裔就是某些菲化政策的倡导者。另外还有一些刚加入菲律宾国籍的华人,他们虽拥有菲律

宾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但因人数和力量都十分有限,他们往往只参加政治选举,很少以被选举人的身份参政。这一时期,华人很想尽快融进菲律宾主流社会,但受到抑制和排斥。

三、70年代中后期,华人开始主动参与主流社会的政治活动

1965年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统后,对华侨、华人的政策有了较大改变,由限制、排斥转为同化和利用相结合,这对菲华社会政治意识的转变产生了正面影响。但真正促使菲华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的是1975年菲政府对华人入籍条件的放宽,以及后来的中菲建交和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政策的影响。从7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大多数华人选择了加入菲律宾国籍。入籍问题的解决为菲律宾华人直接参政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菲律宾不分种族、血统,一旦入籍就视同菲律宾公民而享有与土著同等的权力,没有等级贵贱之分。因此,华人入籍后正式成为菲律宾公民,在直接参政成为可能的情况下,其参政意识和政治参与度都有很大提高。不少华人都认识到,即使自身的经济地位再高,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保障也是十分脆弱的,而且,政治地位低也难以在菲律宾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充当被动的角色,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

自80年代开始,受世界各地华人参政浪潮的影响,菲律宾华人参政议政的热情和行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特别是1986年大选期间,菲律宾华人、华裔踊跃问鼎政坛,第一次主动地参加国会参众两院的竞选活动,且毫不讳忌地公开承认自

己的华人血统和华人背景。菲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竞选前在致华裔选民的公开信中就曾明确表示,自己曾受益于华裔祖先的遗训并以此为荣。在阿基诺内阁和国会参众两院中活跃着许多华人、华裔的身影,如财政部部长王彬,工商部部长康习商,农业部部长王海棉,总务部部长锡牙,教育部部长郭顺敏,大理院首席法官郝建祥,以及菲律宾最具影响力的大主教辛海棉等等。1986年的大选普遍被认为是菲华历史的转折点,华人参政不论是实质上还是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随着土生华人、华裔青年人数的不断增加,华人的参政意识日渐强烈。1987年成立的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可以说是新时期菲华青年的代表。这些年轻的华裔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认同菲律宾为自己国家的同时也肯定自己的华裔身份,他们认为参政是华人作为菲律宾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华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自身的平等合法的地位与正当权利。“菲华青联”成立后,参政献策成为其重要工作之一。他们与菲律宾政府和国会均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与交往,凡是涉及到菲华社会以及整个菲律宾社会利益的重大决策,他们都坦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充分展示了新一代菲律宾华人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积极参政议政的新形象。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尽管菲律宾华人很早就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但在政治上却很难融入主流社会。他们历经几个世纪才完成了从侨民到公民,由“客人”意识向“主人”意识的转变。1975年以前,由于大多数华人的侨居身份,加上菲律宾当局对华人政治融合的阻碍与限制,他们很少对当地政治发表意见,更不用说主动参政了。这个时期,即便是华人对菲律宾政治活动的有限参与

也是以间接形式进行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自身的有限利益得以保障。对华人来讲,这种间接的政治参与往往是被动的,有些则是为了生存所迫。他们是游离于菲律宾政治生活之外的一群。这一时期华人对政治的参与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华人参政。自1975年华人大规模入籍,其政治身份得以确认以后,菲律宾华人、华裔的参政活动才真正展开,并于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菲律宾华人的参政意识逐渐开始加强,与当地的政治融合度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当然,华人参政现象的日渐增多和华人参政意识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华人同菲律宾主流社会实现了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融合。目前,菲律宾华人的政治地位依然十分脆弱,华人参政还不够充分,面临的问题也不少,因此,未来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怎么说,从间接到直接,从自发到自主、自为,菲律宾华人在参政的路途上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随着新一代华裔的不断成长,他们参政的主体意识已经并正在发生着变化,与老一辈华人相比,他们更加理性、务实。从上几代人艰辛的历程中他们已经认识到,融合是趋势,参政是必然,并开始积极主动地、有计划有目标地投身到菲律宾的政治生活中,他们是菲律宾华人的希望,也是菲律宾的希望。

参考文献:

[1][2][4][5]黄滋生,何思兵. 菲律宾华侨史[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 140-141, 308, 388, 482.

[3]陈守国著,施华谨译. 菲律宾五百年的反华歧视[M]. 菲律宾: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 1989. 19.

【责任编辑 尔东】